

範第16條第1項則規定：「律師接受事件之委託後，應探究案情、忠實蒐求證據，於合理範圍內為委任人之利益提出合法且適當之證據，並得在訴訟程序外就與案情或證明力有關之事項詢問證人，但不得騷擾證人，或將詢問所得作不正當之使用。」

就此，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民事判決曾認定：「律師為善盡受任人之責任，本應忠實搜求對當事人有利之事證，且就發現真實之必要，自有在法庭外接觸證人之必要，以了解是否有傳喚證人之必要性，且為督促證人遵期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作證，則當然會與證人有所接觸」²。依該判決所載，法院認為律師為查明事實，確認為無傳喚證人的必要性，確實有必要於訴訟外接觸證人，故法院於該案中，並未僅因律師曾在訴訟外接觸證人認定該證人證述不可採信。

試想，如法院依律師之聲請傳喚某位證人，但在此之前該律師從未接觸訪談該證人，致無從確知該證人對待證事項有無親身見聞，終致該證人出庭作證時稱其對待證事實根本未曾見聞，不僅耗費訴訟資源，更無助於法院發現真實。除非該證人對該律師而言屬敵性證人（因此現實上也無從接觸訪談），或有其他特殊例外情形，否則聲請傳喚未曾訪談之證人到庭作證，恐對於促進訴訟之目的而言並無助益。

實則，參照國民法官法第55條第1項規定：「辯護人或被告依前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規定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之情形，應即向檢察官開示下列項目：一、聲請調查之證據。二、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或通譯於審判期日前陳述之紀錄，無該紀錄者，記載預料其等於審判期日陳述要旨之書面。」，要求辯護人向法院聲請傳喚證人時，應向檢察官開示所聲請傳喚證人先前之陳述紀錄。顯見國民法官法立法意旨，亦期待辯護人於聲請傳喚證人前，先行瞭解證人陳述要旨，並應於聲請傳證時，提供檢察官參閱。足見辯護人於訴訟外接觸證人，瞭解其陳述意旨，亦為前開規定意旨認可。

尤以，按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8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到庭，應先行確認證人之聯絡方式，於必要時並應聯繫證人且督促其遵期到庭。」益見律師有在證人到庭作證前與證人接觸聯繫的必要性，否則欲督促證人到庭，恐有困難。第141條則規定：「檢察官、辯護人為確認聲請調查證人之必要，或實現集中、順暢且簡明易懂之證人交互詰問，應事先詳閱偵查卷證及釐清相關事實。」可見律師就「釐清相關事實」之部分，亦有接觸證人與其訪談之必要。

誠然，律師為「探究案情」、「蒐集證據」，固有必要事前接觸證人、訪談證

人，但亦有界限。按律師倫理規範第16條第3項規定：「律師不得自行或教唆、幫助他人作偽證，或使證人於受傳喚時不出庭作證，或使證人出庭作證時不為真實完整之陳述。但有拒絕證言事由時，律師得向證人說明拒絕證言之相關法律規定。」第17條第2項規定：「律師於訪談證人過程中不得故意為下列行為：一、教唆偽證、誘導證人為不實陳述。二、就重要之事實或法律，向證人為虛偽陳述。」

就此，律師訪談證人要點第6條規定：「律師於訪談證人過程中不得故意為下列行為：一、使用強暴、威脅、利誘、欺騙或其他不正方法進行訪談。二、以提供利益方式誘使證人提供證據，或提出明知為虛偽之證據。三、要求證人不向對造當事人提供相關資訊。四、教唆偽證、誘導證人為不實陳述。五、就重要之事實或法律，向證人為虛偽陳述。六、以其他方法不當影響證人之記憶或認知。」

綜合以上律師倫理規範、律師訪談證人要點等規定可知，律師訪談證人之界限，主要在於：不得「誘使要求證人於作證時為虛偽或不完整之陳述」，以及不得「誤導證人」。就前者而言，如律師於訪談時誘使或要求證人在作證時為虛偽陳述，不僅構成教唆他人偽證之犯罪行為，亦不容於倫理規範。就後者而言，即涉及律師在訪談證人時，如遇證人記

憶不清或無法確認時，可否提示案件資料以喚起證人記憶之問題。就此，律師訪談證人要點第7條規定：（第1項）「律師為釐清事實或喚醒證人之記憶，得於訪談過程中提示證據或其他資料予證人辨識，但律師明知證據或資料虛偽不實者，不得於訪談時提示之。」（第2項）「律師依前項規定向證人提示證據或資料時，應注意避免使用有使證人誤解證據或資料涵義之虞的方法提示。」依此，律師於訪談過程中得提示案件資料予以辨識，但律師不得提示虛偽資料，並應避免提示可能使證人誤解之資料。

關於律師訪談證人時可否提示「案件資料」予證人參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857號刑事判決曾以：該案證人於接受辯護人主詰問時，檢察官當庭異議證人「手持筆記照唸」，經合議庭檢視筆記內容，發現有該案準備程序筆錄，並有簡單筆記案關人員於案發時的相對位置。該證人亦證稱：「我有去過辯護人的事務所2次，辯護人有大概跟我說他主詰問的時候會問什麼問題，我有跟辯護人說會回答什麼，辯護人請我陳述當天看到的正確事實，當然也有告訴我的權益，因為律師也要確認我的證詞是不是真正對他們有利」等語，因而就該證人於審判中之證述可否採信，該判決認定：「固然，依據律師倫理規範第16條、第17條規定，律師接受事件委託後得於訴訟程序外就案情或證明力有相

關事項詢問證人，其界限乃律師不得有教唆偽證、誘導證人為不實陳述，或就重要之事實或法律，向證人為虛偽陳述。惟參以上開判決說明³，主詰問過程中，僅有於證人有記憶不清或其他例外之情形，始可為喚起記憶所必要之誘導。然本案辯護人於本院審理程序時，未經交互詰問過程中確認證人……是否有記憶不清或其他但書之情況，即於訴訟程序外提示本院……準備程序筆錄供證人……閱覽，更將卷證筆錄內容影印後提供予證人……攜回反覆查看，甚至使證人……可得於審理程序時攜至法庭作證，證人……所為之證詞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之誘導詰問所容許之範圍，實存疑問，縱然本案未有證人……具結後為偽證之情況，仍難排除證人……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已遭污染，而與其所記憶之真實情形有所背離。」⁴依法院記載之判決理由，法院因認該證人在訴訟外接觸該案準備程序筆錄，質疑其於審判中之證述已遭污染，未予採信。

前述判決以律師於訴訟外接觸證人、提供案件資料供證人審閱為由，認定該證人於審判中陳述不可採信，固屬事實審法院基於卷證資料所為證據取捨之範疇，未必與倫理議題直接相關。然如前述，律師於訴訟外接觸、訪談證人，既屬律師忠實執行職務所必要，卻可能因訪談過程之作為引發質疑。尤其，每

位證人個性、口條、陳述能力均有不同，對於待證事實之掌握、記憶亦可能有所差異，證人於受訪時未必能清楚陳述表達所見所聞。此時律師可否協助證人釐清記憶？可否在確認證人真意後，提供證人更能清楚傳達心中真意的用字遣詞？對於不熟悉訴訟程序的證人，律師可否告知證人在法院作證時可能的遭遇及法院審理流程？對於容易緊張怯場的證人，可否向其預告律師及對造在其作證時將會詢問的問題，以便證人預先準備？凡此，均涉及律師於訪談過程應謹守之倫理及法律上的界限應如何界定，值得深究。

本此問題意識，本文旨在探討證人訪談之必要性與其倫理界限。為此，本文將比較美國實務對於律師訪談證人所應遵守的倫理規範，據此彙整律師在訪談證人乃至於準備證人時所應遵循的事項，期待各界能正面看待證人訪談及證人準備，不應任意曲解證人訪談，更不應僅以證人曾接受訪談即武斷認定此證人所述可能遭受誤導。畢竟，合法且必要的「證人準備」(witness preparation)與「證人指導」(witness coaching)，實有不同。

需另說明者為，限於篇幅，本文僅探討律師訪談對待證事實有親身見聞的一般自然事實證人(lay witness)的倫理規範。至於鑑定人、專家證人(expert

witness) 的訪談規範則不在討論範圍。

貳、美國律師倫理規範

一、美國律師協會模範專業行為準則

在美國，律師執業時應遵守的律師倫理規範，是由各州律師公會所自行決定。於此同時，美國全國性律師組織——「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訂有「模範專業行為準則」(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下稱「模範準則」)，經美國大多數州律師公會採納，被視為美國執業律師應遵守之「基本規範」⁵。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76年 *Geders v. United States*⁶ 判決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引用模範準則前身，也就是美國律師協會制定的「專業責任法典」(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用以界定律師在與證人接觸時所應遵守的重要倫理界限⁷。

按模範準則第1.1條規定：律師代表其當事人，應具備為能勝任該委任事務所需之專業資格及能力，包含法律專業知識、技能、完整思考，以及準備工作⁸。基於本條規定的倫理要求，一般咸認律師不僅有訪談並準備證人的必要及正當性基礎，訪談並準備證人甚至為律師代理案件本應盡的倫理義務⁹。

另一方面，模範準則亦訂有律師不

得跨越的倫理界限。首先，模範準則第1.2(d)條規定：當律師知其當事人欲從事之行為屬犯罪或詐騙，律師不得對其當事人提供法律諮詢，亦不得提供協助，但律師得與該當事人討論其所欲從事行為為可能的後果，並得提供諮詢或協助當事人基於「善意」決定法律規定的效力、範圍、意義及適用¹⁰。依此規定，當律師發現當事人欲為包含偽證在內之違法行為，或唆使他人為之，律師均不得提供該當事人協助或提供用以支持鼓勵該當事人從事前述行為之法律諮詢意見。

不僅如此，模範準則第3.3(a)條更進一步規定：律師不得故意提出該律師明知屬虛偽不實的證據，如律師發現其提出之證據，或其當事人或其傳喚之證人提出之證據，係虛偽不實之證據，則該律師應採取一切合理的救濟手段，包括（如有必要）向法庭揭露前述情形¹¹。第3.4(b)條則規定，律師不得偽造證據，亦不得提供諮詢或協助證人從事不實證述，或誘使該證人從事法律禁止之事項¹²。也因此，律師不得使其當事人或證人為虛偽陳述，如發現有前述情形，更有向承審案件法庭舉報的義務。但於此有探討空間者為：何謂「律師明知屬不實之證據」？亦即，此所稱之「明知」是否應到達「明確知悉」(actual knowledge)之程度？如是，又應如何證明律師確實「明確知悉」證據為虛偽？

此處合理的解釋或許為：自個案具體情狀判斷，該律師已明確知悉證據為虛偽¹³。

此外，模範準則第4.4(a)條規定，律師在受當事人委任時，不得利用違反第三人法律權利之方法取得證據¹⁴。同時，第8.4(c)、8.4(d)條分別規定，律師如有不誠實、詐欺、欺騙、虛偽陳述之行為，或有妨害司法管理程序之行為，均屬有違專業倫理之不當行為¹⁵。

綜合以上規範，固可瞭解模範準則明文禁止律師促使證人為虛偽陳述，但並未明確規範律師在訪談證人時所應遵守的倫理界限。實則，律師為協助證人出庭作證而訪談證人，即一般所稱「證人準備」(witness preparation)，不僅已屬常見，更出現提審判諮詢(trial consulting)之專業服務¹⁶。於此情形之下，準備證人時應遵守之倫理及法律規範，即屬重要課題。

先前提及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Geders v. United States* 判決，該判決對於本文主題之重要意義在於，該判決援引美國律師協會制定的倫理規範，據此認定律師與證人互動時，確實存在著重要倫理界限：如為證詞討論，則屬正當；但如企圖影響證詞，則非正當¹⁷。

在該判決中，該案被告於審判程序作證過程中，經法官命令隔離訊問(sequestering)，致該被告在接受主詰問

完畢後，在隔天繼續接受反詰問前，有長達17小時的整夜休庭期間，無法接受辯護人諮詢及協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定前述法院命令侵害被告受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保障之接受辯護人協助之憲法權利，因而將下級審裁判撤銷發回。該判決指出在審判程序中，法院有很多其他方法來處理解決可能的「不當影響證詞」(improper influence on testimony)或「證人指導」(coaching of a witness)，諸如透過反對詰問即可查知該證人有無受到不當之影響¹⁸。然而，該判決並未進一步具體界定何謂「影響證詞的不正當企圖」(improper attempts to influence the testimony)¹⁹。從而，模範準則固然揭示律師訪談證人時所應遵守的原則性倫理規範，但就「核心問題」——何謂「適當準備」(proper preparation)？何謂「不適當影響」(improper influence)？仍有探討空間。

二、美國律師協會「證人準備倫理意見書」

美國律師協會在2023年8月5日公布「第508號正式意見書」(Formal Opinion 508)「證人準備倫理」(the Ethics of Witness Preparation)(下稱「證人準備倫理意見書」)²⁰。該意見書經彙整模範準則對於證人準備時所為規範，並臚列長期以來普遍肯認律師於準備證人時「可以」從事的行為，包含：²¹

(一) 提醒其將在宣誓具結之前提下作證；

(二) 強調據實陳述的重要性；

(三) 向證人解釋，如對所詢事項已不復記憶，可如實回答：「我不記得了」。

(四) 向證人解釋案件策略及程序，包含其作證程序的本質或審前取證 (deposition) 的目的。

(五) 建議出庭作證時適當的穿著、外在表現，以及禮儀。

(六) 提供證人證述的前後事實脈絡。

(七) 詢問證人適當的證詞及回憶。

(八) 向證人舉出其他可能提呈的證詞，進而瞭解基於該等證詞，證人對於待證事實之理解為何。

(九) 與證人一起審視文件、物證，包含以文件喚起證人對待證事實的記憶。

(十) 告知證人可能詢問的問題以及可能的反對詰問。

(十一) 建議證人使用較易清楚表達真意的用語。

(十二) 告知證人在問題尚未詢問完畢前不要回答問題。

(十三) 強調保持鎮靜的重要性，不要與詰問律師爭辯。

(十四) 告知僅需就所知事項作證，不要臆測。

(十五) 使證人瞭解其應專注於回答所詢問題，而非自願提供資訊。

至於「不符合倫理規範」的「證人指導」(witness coaching) 行為，證人準備倫理意見書指出，除要求證人作成虛偽陳述或予以提供協助等明確違反倫理規範之行為外，建議證人違反法院關於證據開示或審判程序之命令、違法誘導證人、促使證人不出庭作證等，均屬可能的違反倫理態樣。其中，關於「要求證人虛偽陳述」的行為，除明白要求證人為不實陳述外，亦有可能存在其他行為態樣。例如，要求證人作證時「短報」與律師見面準備審判的次數，或鼓勵當事人提供不實的案發位置地點，致使所為陳述與事實不符，均可能落入使證人虛偽陳述的行為態樣。此外，證人準備倫理意見書指出，違反倫理的行為態樣尚包括：設計證人證詞、違反法院關於證人隔離或不得接觸證人之命令、鼓勵證人提出編造的證詞等²²。

值得注意的是，證人準備倫理意見書提及，對於一般證人所為之證述提供報酬，或者以證人證述的內容作為提供報酬的條件，即便證人的證述內容為真實，以上行為仍有違反倫理規範的可能。此外，向證人給付金錢以作為該證人不作證的對價，更為明確違反倫理規範的行為²³。

三、美國法律學會律師規範

第三整編

關於美國律師執業時應遵守之準則規範，除前述美國律師協會制定的模範準則及其發布之意見外，另多半也會參照「美國法律學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經彙整各州倫理規範及實務意見後，編制而成之「律師規範第三整編」(Restatement (Third) of the Law Governing Lawyers)。

依該協會在2000年制定、2023年更新之「律師規範第三整編」第116條第1項規定：「律師得為證人準備作證之目的訪談證人」²⁴。從而，本條規定已明白肯認律師得於訴訟外接觸、訪談證人，且得為訴訟之目的，在符合本條規範意旨的前提下，為證人提供準備。

關於「證人準備」，本條規定之說明意見(comment)進一步指出：

在為證人準備作證時，律師得促請證人提供對於該律師當事人有利之真實證述。符合本節規範的證人準備包含：與證人討論證人之角色以及在法庭內有效的外在舉止；與證人討論其對待證事件之回憶及合理的證詞；向證人揭露在審理程序中將被提呈的其他證詞及證據，並要求證人基於前述證詞或證據，重新評估證人對於待證事件的回憶以及對於事件的描述；與證人討論待證事件所應適用的法律；審視評估該證人的觀察或意見所形塑的事實脈絡；審視評估

可能會被提出的文件或其他物證；討論證人在接受具有敵意的反對詰問時可能會遭遇的詰問方向。律師可以為證人演練作證過程。律師也可以提供證人使其證言更能清楚達意的用語建議。但律師不得協助證人對於重要待證事實提供虛偽證述。²⁵

依此可知，在律師與證人互動過程中，如不涉及「待證事實」，例如關於訴訟程序、作證流程、法庭禮儀等，律師可以提供資訊或建議供證人參考。前述美國律師協會「證人準備倫理意見書」亦有相同闡述。但關於「待證事實」，原則上應由證人向律師說明其所知事實為何。實則，早在1880年，美國紐約州律師懲戒案件*In re Eldridge*案，即已闡示：「律師的職責是向證人挖掘事實，而非將事實強灌於證人；是向證人探求該證人所知為何，而非教導證人其應知悉之事。」²⁶依此，關於「事實」的探索，其資訊流應是自證人流向律師，而非相反。

至於在證人已表達其對待證事實的認知後，如律師為向證人確認所述內容，或者因證人表示記憶不清而有協助證人回憶之必要時，律師此時提示予證人的參考資料，如在「在審理程序中將被提呈的其他證詞及證據」範圍內，依前述第三整編第116條說明意見，應可認為合乎倫理規範。就此，有論者認為，如法院已命令該證人應予隔離(sequestration of witnesses)，亦即，該

證人不得與其他證人接觸，亦不得知悉其他證人之證詞，則律師不得將其他證人先前所為之證述告知該證人；於此情形，律師雖得向該證人詢問特定待證事項，但不得向該證人暗示其他證人所為證述與該證人先前的說詞不同²⁷。

參、代結語：延伸思考

如前所述，在律師訪談證人過程中，如就待證事實有關事項，原則上應係由證人提供資訊予律師。此處另需延伸思考的問題為：律師可否在訪談過程中向證人說明與案件有關之資訊，或者提示證人先前未曾取得或知悉之案件證據資料供證人參閱？此或許亦為本文前言提及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857號刑事判決，法院未採信該案經訪談的證人所為證述的原因所在。

就提供案件有關資訊部分，前述美國法律學會第三整編第116條說明意見雖提及律師可向證人說明案件所應適用之法律，惟未明確認可律師得向證人說明案件訴訟策略及他造主張等事項。然美國律師協會之「證人準備倫理意見書」似認為律師可向證人說明其於案件中主張的訴訟策略。

有論者建議，律師應當在證人說明其對待證事項完整認知「後」，才能向證人說明以上案件相關資訊，以免影響證人記憶，產生先入為主或附和他人說詞

的疑慮，或導致證人為配合律師的訴訟策略而調整證詞的可能²⁸。

另參諸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8條第3項規定：「證人表明到庭有困難或不願到庭者，檢察官、辯護人宜以懇切態度了解其原因，如有必要者，並得視實際需要，說明下列事項，或協助證人獲得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之照料或保護措施：一、刑事審判程序。二、交互詰問之流程。三、法院之環境。四、證人作證義務。五、證人拒絕證言事由。六、其他與證人權利、義務、保護措施相關之事項。」該規定闡釋檢察官、辯護人對於證人的照料義務，以確保證人得到庭作證，進而發現真實。其中所列得向證人說明之事項，不包含與案件有關之資訊，然此並無法當然解釋為檢察官、辯護人不得向證人說明與案件有關之資訊。

然無論採取何種見解，律師在訪談中不應提供虛偽不實之資訊或錯誤之見解，致使證人形成錯誤認知、遭受誤導，此應為不得跨越的倫理防線。

至於就提示案件有關證據資料部分，美國律師協會「證人準備倫理意見書」、美國法律學會第三整編原則上都認可律師得於訪談時提示該案審理程序中可能經提出於法院的其他證人之證述，以及其他證據資料。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訪談證人要點第7條則規定：「律師為釐清事實或喚醒證人之記憶，得於訪談

過程中提示證據或其他資料予證人辨識，但律師明知證據或資料虛偽不實者，不得於訪談時提示之。」¹ 基此，律師得提示案件有關卷證資料予證人參閱辨識，應無疑問。所提示予證人之資料不得為律師明知為虛偽不實者，則屬當然。

較有爭議的問題在於：律師得否提示其他證人證述予證人參閱，尤其當其

他證人之證述顯然與該律師所訪談之證人有所出入時，不免有致使證人懷疑自己的記憶是否正確，因而改變證詞的疑慮。但於此情形中，律師如能向證人告知其應按所知「據實陳述」，不應因其他證人不同的說法就改變自己陳述的內容，則如此提示他人證述或可協助證人回復記憶並探求實情，與發現真相的基本價值，亦無抵觸。♣

註釋

- * 作者為萬國法規暨政策研究中心執行長；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教育訓練委員會主委；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本文為作者個人觀察及意見，不代表所任職事務所之立場。
1. 參見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訪談證人要點，網址：<https://www.twba.org.tw/regulation/bylaws2/f343a676-be17-4110-83af-51873b7a087c>（最後瀏覽日：2023年10月8日）。
 2. 參照司法院裁判書系統，此判決目前查無第二審裁判，網址：<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SLDV,112%2c%e9%87%8d%e5%8b%9e%e8%a8%b4%2c2c20230913%2c2>（最後瀏覽日：2023年10月8日）。
 3. 此處所稱「上開判決說明」，係指該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引用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222號刑事判決。以下為該臺北地院刑事判決摘錄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意旨：「按誘導詢問方式，是否為法所許，端視其誘導詢問之暗示，是否足以影響被詢問者陳述之情形而異。如其詢問內容，有暗示被詢問者使為故意異其記憶之陳述，固屬虛偽誘導；或有因其暗示，足使被詢問者產生錯覺之危險，致為異其記憶之陳述，則為錯覺誘導，為保持程序之公正及證據之真實性，均非法之所許。然如其暗示，僅止於引起被詢問者之記憶，進而為事實之陳述，係屬記憶促醒，參照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1第3項第3款規定於行主詰問時，關於證人記憶不清之事項，為喚起其記憶所必要者，得為誘導詰問之相同法理，則無禁止之必要，應予容許。」
 4. 參照司法院裁判書系統，此判決目前查無第二審裁判，網址：<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M,111%2c%e8%a8%b4%2c857%2c20230711%2c1>（最後瀏覽日：2023年10月8日）。
 5. Liisa Renee Salmi, *Don't Walk the Line: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Preparing Witnesses for Deposition and Trial*, 18 REV. LITIG. 135, 138 (1999).

6. *Geders v. United States.*, 425 U.S. 80 (1976).
7. *Id.*, 90 n.3 (“An attorney must respect the important eth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discussing testimony and seeking improperly to influence it. Ethical Consideration 7-26 of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1975) states: “The law and Disciplinary Rules prohibit the use of fraudulent, false, or perjured testimony or evidence. A lawyer who knowingly participates in introduction of such testimony or evidence is subject to discipline. A lawyer should, however, present any admissible evidence his client desires to have presented unless he knows, or from facts within his knowledge should know, that such testimony or evidence is false, fraudulent, or perjured.”
Disciplinary Rule 7-102 of the Code provides in relevant part:
“(A) In his representation of a client, a lawyer shall not:
“(6)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on or preservation of evidence when he knows or it is obvious that the evidence is false.
“(7) Counsel or assist his client in conduct that the lawyer knows to be illegal or fraudulent.
“(8) Knowingly engage in other illegal conduct or conduct contrary to a Disciplinary Rule.”
Any violation of these strictures would constitute a most serious breach of the attorney's duty to the court, to be treated accordingly.
We note that the judge expressed full confidence that petitioner's trial attorney would respe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ssistance and improper influence.”).
8.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Rule 1.1 (“A lawyer shall provide competent representation to a client. Competent representation requires the legal knowledge, skill, thoroughness and preparation reasonably necessary for the representation.”).
9. *See, e.g., United States v. Rhynes*, 218 F.3d 310, 319 (4th Cir. 2000) (“To all clients, an attorney owes competence... To fulfill this basic duty, the attorney must prepare carefully for the task at hand: “Competent representation requires ... thoroughness and preparation reasonably necessary for the representation.”...”). *See also*, Richard C. Wydick, *The Ethics of Witness Coaching*, 17 *CARDOZO L. REV.* 1, 1 (1995).
10.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Rule 3.3(a) (“A lawyer shall not counsel a client to engage, or assist a client, in conduct that the lawyer knows is criminal or fraudulent, but a lawyer may discuss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any proposed course of conduct with a client and may counsel or assist a client to make a good faith effort to determine the validity, scope, meaning or application of the law.”).
11.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Rule 3.3(a) (“A lawyer shall not knowingly:...(3) offer evidence that the lawyer knows to be false. If a lawyer, the lawyer’s client, or a witness called by the lawyer, has offered material evidence and the lawyer comes to know of its falsity, the lawyer shall take reasonable remedial measures, including, if necessary, disclosure to the tribunal. A lawyer may refuse to offer evidence, other than the testimony of a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matter, that the lawyer reasonably believes is false.”).
12.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Rule 3.4(b) (“A lawyer shall not:...(b) falsify evidence, counsel or assist a witness to testify falsely, or offer an inducement to a witness that is prohibited by law...”).

13. Richard C. Wydick, *The Ethics of Witness Coaching*, 17 CARDOZO L. REV. 1, 20 (1995).
14.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Rule 4.4(a) (“In representing a client, a lawyer shall not... use methods of obtaining evidence that violate the legal rights of such a person.”).
15.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Rule 8.4(c) & 8.4(d) (“It is professional misconduct for a lawyer to:... (c) engage in conduct involving dishonesty, fraud, deceit or misrepresentation; (d) engage in conduct that is prejudicial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16. Nicole LeGrande & Kathleen E. Mierau, *Witness Preparation and the Trial Consulting Industry*, 17 GEO. J. LEGAL ETHICS 947 (2004).
17. 同註7。
18. *Id.* at 89-90 (“There are other way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possible improper influence on testimony or ‘coaching’ of a witness... The opposing counsel in the adversary system is not without weapons to cope with “coached” witnesses. A prosecutor may cross-examine a defendant as to the extent of any ‘coaching’ during a recess, subject, of course, to the control of the court. Skillful cross-examination could develop a record which the prosecutor in closing argument might well exploit by raising questions as to the defendant's credibility, if it developed that defense counsel had in fact coached the witness as to how to respond on the remaining direct examination and on cross-examination.”).
19. *Id.* at 87 (“Sequestering a witness over a recess called before testimony is completed serves a third purpose as well preventing improper attempts to influence the testimony in light of the testimony already given.”).
20.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BA issues ethics guidance outlining model rule guardrails when lawyers prepare witnesses*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americanbar.org/news/abanews/aba-news-archives/2023/09/ethics-guidance-witness-preparation/#:~:text=Formal%20Opinion%20508%20explains%20the,ethical%20duties%20to%20diligently%20and> (last visited October 9, 2023). 關於美國律師協會「證人準備倫理意見書」全文則請參見：https://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administrative/professional_responsibility/aba-formal-opinion-508.pdf (last visited October 9, 2023)。
21.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Formal Opinion 508, *The Ethics of Witness Preparation* 3-4, (2023).
22. *Id.*, at 4-5.
23. *Id.*, at 6.
24. Restatement (Third) of the Law Governing Lawyers § 116(1) (2000) (“A lawyer may interview a witness for the purpose of preparing the witness to testify.”).
25. Restatement (Third) of the Law Governing Lawyers § 116 Comment (2000) (“In preparing a witness to testify, a lawyer may invite the witness to provide truthful testimony favorable to the lawyer's client. Prepar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rule of this Section may include the following: discussing the role of the witness and effective courtroom demeanor; discussing the witness's recollection and probable testimony; revealing to the witness other testimony or evidence that will be presented and asking the witness to reconsider the witness's recollection or recounting of events in that light; discuss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law to the events in issue; reviewing the factual context into which the witness's observations or opinions will fit; reviewing documents or other physical evidence that may be introduced; and discussing probable lines of hostile cross-examination that the witness should be prepared to meet. Witness preparation may include rehearsal of testimony. A lawyer may suggest choice of words that might

be employed to make the witness's meaning clear. However, a lawyer may not assist the witness to testify falsely as to a material fact (see § 120(1)(a).”).

26. *In re Eldridge*, 37 N.Y. 161, 171 (N.Y. 1880) (“[A lawyer’s] duty is to extract the facts from the witness, not to pour them into him; to learn what the witness does know, not to teach him what he ought to know”).
27. Roberta K. Flowersa, *Witness Preparation: Regulating the Profession’s “Dirty Little Secret”*, 38 HASTINGS CONST. L.Q. 1007, 1027 (2011).
28. *Id.* at 1023-1024 & 1027.

關鍵詞：證人訪談、律師倫理、模範專業行為準則（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美國法律學會律師規範第三整編（Restatement (Third) of the Law Governing Lawyers）

DOI：10.53106/279069732002

（相關文獻➡月旦知識庫 www.lawdata.com.tw；
更多裁判分析➡月旦法律分析庫 lawwise.com.tw）